

1911-1960



影像

中國

國共分合

向左走・向右走

中央通訊社、商周出版編輯部——合作出版

何飛鵬——總策畫

黃克武——總論

邵銘煌——導讀

1911-1960

影像

中國

國共分合

向左走・向右走

中央通訊社、商周出版編輯部——合作出版

何飛鵬——總策畫

黃克武——總論

邵銘煌——導讀

影像 中國 1911-1960

映像紀實 24
國共分合
向左走·向右走

照片資料提供 _____ 中央通訊社
編輯企劃 _____ 商周出版編輯部、中央通訊社
總策畫 _____ 何飛鵬
總論 _____ 黃克武
導讀 _____ 邵銘煌
顧問 _____ 林桶法、林蘭芳、邵銘煌、唐啟華、黃克武、劉素芬、劉維開、歐素瑛（依姓氏筆畫序）
書法題字 _____ 董陽孜
主編 _____ 黃靖卉、林淑華、范雅鈞、陳錦昌
責任編輯 _____ 林淑華
版權 _____ 翁靜如
行銷業務 _____ 張娛茜、黃崇華
總編輯 _____ 黃靖卉
總經理 _____ 彭之琬
發行人 _____ 何飛鵬
法律顧問 _____ 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
出版 _____ 商周出版
台北市 104 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9 樓
電話：(02) 25007008 傳真：(02) 25007759
E-mail：bwp.service@cite.com.tw
Blog：http://bwp25007008.pixnet.net/blog
發行 _____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2 樓
書虫客服服務專線：02-25007718、02-25007719
24 小時傳真服務：02-25001990、02-25001991
服務時間：週一至週五 9：30-12：00；13：30-17：00
劃撥帳號：19863813；戶名：書虫股份有限公司
讀者服務信箱 E-mail：service@readingclub.com.tw
香港發行所 _____ 城邦（香港）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香港灣仔駱克道 193 號；E-mail：hkcite@biznetvigator.com
電話：(852) 25086231 傳真：(852) 25789337
馬新發行所 _____ 城邦（馬新）出版集團【Cite (M) Sdn Bhd】
41, Jalan Radin Anum,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, 57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.
電話：(603) 90578822 傳真：(603) 90576622
套書整體設計 _____ 徐璽
內頁編排 _____ 徐璽設計工作室
印刷 _____ 卡樂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
總經銷 _____ 高見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：(02) 26689005 傳真：(02) 26689790
2014 年 5 月 6 日初版
Printed in Taiwan
套書定價 9800 元

著作權所有，翻印必究
ISBN 978-986-272-557-3

城邦讀書花園
www.cite.com.tw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影像·中國：1911-1960：國共分合 向左走·向右走
/ 中央通訊社作，-- 初版，--
臺北市：商周出版：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，2014.05
面；公分，--（映像紀實；24）
ISBN 978-986-272-557-3（精裝）

1. 中華民國史 2. 新聞攝影 3. 照片集

總策畫 序

讓圖片說話， 還原歷史真相

一九八六年，我為了籌辦臺灣經濟影像回顧展，需要一些臺灣的老照片，而到了中央社的照片資料庫，這是我第一次接觸中央社的圖片庫。

當我踏進中央社的大門之後，我看到了中央社豐富的照片檔案，除了有四九年遷臺之後，在臺灣早期的照片之外，我更發覺從中央社成立以來，一九四九年以前，在中國拍照留存的各種歷史檔案照片：從歷史新聞事件、人物照片到八年抗戰隨軍拍攝的照片，當然還兼及整個社會經濟、民生的照片。

我一方面震懾於圖片庫的豐富、多元及珍貴，一方面就埋下了終有一天，我要將這些珍貴照片公諸於世的心願，不要讓這記錄了中華民國成立以來的寶貴影像，一直埋藏在檔案櫃之中。

一九九六年，我們創立了城邦出版公司，從那時起，我離這個讓中央社寶貴的照片問世的願望就近了一些。可是這十幾年來，我雖曾嘗試接觸中央社，試圖出版這些照片，但一直未能如願。

一直到二〇一二年，城邦已成長成臺灣第一大出版集團，我們有更大的實力實現此一願望，我再度嘗試敲開中央社的大門。

我們做出了一套完整的出版計畫，準備出版一套《影像·中國》的套書，以涵蓋一九一一年中華民國成立，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播遷來臺至六〇年以前戰後臺灣的歷史，完全用影像說故事，以最真實的照片描述這一段歷史，而主角就是中央社典藏的照片檔案。

經過幾次的接觸之後，獲得中央社董事長陳國祥的初步認可，我們有機會與中央社經營團隊坐下來仔細商議出版的可能，經過不斷的討論之後，我們終能獲得出版共識，而進入實務的編輯作業。

進入實務的編輯作業才是真正困難的開始。面對中央社典藏超過百萬張的照片庫，我們要如何去挑出有出版價值的圖片，而這些圖片又要用何種出版架構呈現，都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。這還談不上對這些歷史悠久、可能已經變質的老照片必須要仔細修片才能使用的問題。

經過不斷的反覆探索之後，我們最終決定全套八冊的出版架構，四九年之前六冊，四九年遷臺之後兩冊，另加兩冊介紹性的主題別冊，這就是此一套書最終呈現的樣貌。

我之所以心心念念此一套書的出版，除了要讓中央社這些媒體記者前輩的心血能為世人所見，以彰顯他們記錄歷史洪流的巨變之功外，我更想藉此一套書來還原那一段歷史的真相。

自從政府遷臺以來，近代中國歷史變成海峽兩岸各說各話的局面，臺灣與大陸各有一套論述，也都各自採取對自己能自圓其說的論點，彼此並沒有明確的交集。

而中央社的攝影記者們，在歷史變動的第一現場記載了整個巨變的過程，用一張張的照片記錄了每一個變動的瞬間，這應是最寶貴、最接近事實的見證。因此，如果能把這些照片，用歷史的線性記錄出版成冊，絕對可以還原歷史的真相。

除了見證那一段歷史之外，在此次出版的套書中，也有許多民國初年人文、社會、經濟、文化的圖片，可以讓現代人了解當時的生活樣貌——文化、經濟、金融、實業，以及體育等各種面向，這是最直接且完整的記錄。

除了用照片做為全書的主要架構外，針對每一冊的主題，我們也邀請當代的歷史專家，分別寫一篇導讀，以便讀者能對全書的主題，有一個提綱挈領的理解，以增加此一套書的權威性及完整性。

回溯這一套《影像·中國》套書的出版，從起心動念到真正付諸執行、編輯、策畫、出版，凡廿餘年，對我個人而言，一圓了幾十年的心願。而對所有的讀者而言，也有機會把儲存在歷史檔案中的珍貴歷史圖片，讓它重新問世，讓中央社歷代前輩記者先進們的心血，能用更方便、友善的方式與讀者見面，這應是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。

城邦媒體集團首席執行長



豐 收

中央社非常獨特，民國 13 年誕生，到今年已 90 歲了。它不僅僅是中華民國的國家通訊社，肩負國內外傳播的重任，與國家發展同步前進；同時，它在大陸發跡，茁壯於臺灣，面向全球五大洲，更是唯一擁有如此寶貴經驗的新聞媒體。

自成立以來，中央社在各個領域的採訪報導都有傑出的表現，所累積的資料非常多。其中最珍貴的，就是擁有 158 萬張新聞照片：民國 13 年至 39 年大陸時期約 10 萬張，民國 39 年迄今臺灣時期約 148 萬張，現仍陸續增加中。

新聞工作者都知道，每一張新聞照片，報導了每一則新聞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當新聞照片轉換為檔案後，這張照片就敘述了一段歷史。而一張又一張的照片串連起來，加上簡要的文字說明，就成為各界解讀過往的絕佳視窗。

這 158 萬張新聞照片，可說是中華民國從民國 13 年以來的歷史縮影，有官紳名流的樣貌，有市井小民的百態，也有城鄉聚落、經濟建設等情形，不一而足。經過多年的努力，這些照片全部數位化，典藏在中央社的影像空間內。

國內外訪賓參觀中央社，看到影像空間裡的照片，無不讚嘆其內容之豐富，以及難以估算的價值。正因為如此，不光是新聞媒體同業，連國內外學術單位、研究機構也對中央社的照片充滿了興趣，紛紛前來取材鑽研。

記得一位歷史學者參訪中央社後，對民國 39 年之前大陸時期的照片看了又看，愛不釋手，並對這些照片都已數位化，更是豎起了大拇指。他強調，中央社的照片，既是新聞，也是歷史，能保存如此的好，真是不容易。

的確，早期的新聞照片是由藥水沖洗出底片，再由底片沖洗出照片，這些照片若存放不當，很容易退色、沾黏、刮傷等，就無法使用。因此，中央社花了很多的時間、費用及人力，將這些照片掃描、建檔、儲存，重現當年風華。

近年來，中央社積極規劃典藏照片的運用，除了在重大歷史事件上，或特殊紀念日時，接受政府部門、民間業者的委託辦理相關展覽之外，也尋求自行或合作出版書刊的機會，期能透過照片的影像來呈現歷史的原貌。

當城邦出版集團前來洽談合作出版事宜時，聆聽何飛鵬執行長宏觀的構想、編輯人員仔細的規劃後，中央社很認同。雙方往來磋商數回後，中央社與城邦出版集團就決定合作，以典藏照片為本出版《影像·中國》套書。

城邦不僅是臺灣第一大出版集團，擁有各類型書刊的出版經驗，同時出版品也行銷海內外，了解全球各個地方的發行通路，是華人出版界的翹楚。更重要的是，何執行長對歷史關注的情懷，為理想而奮進的努力，令人折服。

畢竟，中華民國的發展軌跡，特別是1949年之前在大陸的階段，中央社的新聞照片都可以為證，絕不容青史盡成灰。而將這些照片集結成書，以影像來讓各界了解史實，也正是中央社與城邦出版集團一致的願望。

於是，將典藏的照片交由城邦出版這套影像書籍，中央社非常放心，全力配合。而這也是新聞媒體與出版業者的跨業合作，雙方各展所長，互惠雙贏的具體表現。這次合作，對中央社、對城邦出版集團而言，都是豐收！

中央社社長



鏡頭下凝結的 歷史瞬間

本套書由中央通訊社記者親臨歷史現場所拍攝的照片編輯而成，這些照片具有非常珍貴的史料價值，編輯團隊從數百萬張影像資料之中精選出最具有代表性的照片，依照主題分為八個單元，來呈現中國近代歷史中的諸多面向，同時為了使讀者更容易掌握其內容，出版社又委請專家學者撰寫導讀，並對每一幅照片加以說明。《影像·中國》一至六冊為民國 38 年（1949）之前中國政治、社會、經濟、文化、軍事與外交等主題，七至八冊則為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之後政經、教育與外交等方面的發展。這一套書讓我們得以跟隨著中央通訊社記者的足跡，親臨歷史現場、還原歷史真相。

書中影像所捕捉到的歷史，包含了自 1911 年辛亥革命以來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。這一時期的中國在共和革命、軍閥混戰、帝國主義入侵與國共內戰的交織下動盪不安。此時期的中國充斥著動亂、血腥與暴力，照片之中所呈現的辛亥革命、北伐、抗戰與國共內戰，尤其可以讓人深刻感受因人禍而導致的災難。但在暴力的背後，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的希望與尋常百姓之日常生活。在辛亥革命之中，人們企求推翻專制、建立共和；在軍閥混亂之中，人們希冀國家統一，而國民黨的北伐成功終於帶來了國家的統一與建設，如新生活運動即象徵著對於現代國家、國民之追尋；另一方面，共產運動的支持者則秉持著平等、正義、破除階級剝削的社會理想。

上述希望的追求又種下了毀滅的種子。1937-1945 年中國面臨了日本的侵略。在面對外患的同時，中國內部因為意識型態的分歧而分裂為二，一個陣營為蔣中正與他所領導的國民黨，以繼承國父孫中山先生的「三民主義」為號召；另一個陣營則是毛澤東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。此一分歧在抗戰期間逐漸顯著，而愈益加深，日本的入侵又給予中共發展製造了很好的機會（難怪毛澤東要感謝日本人）。國共對峙的情勢也因帝國主義國家的涉入而變得更為複雜，國民黨的一方企圖依賴美國，共產黨的一方則倚賴蘇聯（共產國際）。

以上大致是 1945-1949 年國共內戰出現的重要背景。內戰期間，蔣中正所領導之國軍本來具有軍事上的絕對優勢，然在戰略上、外交上卻不如共軍來得靈活，加上國內知識界與國際上要求國共和談的聲浪，蔣中正反而受到諸多牽制。1949 年在內戰之中國軍節節敗退、部分將領倒戈投共，終至丟掉了整個中國大陸。此後政府遷臺，兩岸分治。遷臺初期，中華民國政府痛定思痛，逐漸站穩腳跟、重起爐灶。

這半個世紀之間的歷史與今日海峽兩岸的處境有密切的關係。其中有許多深具歷史意涵的一些議題頗耐人尋味。例如辛亥革命之後為何無法建立平穩的共和政府，中國反而陷入混亂？中國與日本兩國號稱「同文同種」，為何所有和平的努力都歸於失敗（包括汪精衛的努力），必須走向兵戎相見而導致生靈塗炭？抗戰期間國民黨、共產黨如何面對「安內」、「攘外」等議題，其分合的原因何在？影響國共內戰之結果的關鍵因素為何？這些問題都沒有完全清楚的答案。

本套書的影像資料可能無法完全解答上述的歷史議題。其中一個原因是書中照片均來自中央通訊社的單一視角。該社在 1924 年成立以來就與中國國民黨有密切的關係，開始時全稱為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通訊社」，負責發布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重要文告和各種官方消息。其後經過多次改組，並擴充組織，陸續在各地設立分社、派駐通訊員、建立通訊網絡等。1934 年，中央社耗費巨資到國外購買新式機器，增強發報能力，開始與路透社、哈瓦斯社、合眾國際社等國外通訊社簽訂交換新聞協議，從而控制了新聞來源渠道，並得到無線電發布新聞的專利權。中央通訊社因而在中國新聞系統中占有重要地位，成為國民政府的宣傳機構。

這樣的地位使該社一方面累積了大量的新聞照片，另一方面他所「製造」出來的照片都是從中央政府立場出發而展示出的場景。此一情況在戰爭相關的照片尤其明顯，無論是對日戰爭或國共內戰所呈現的都是「我方」觀點。這是在閱讀本套書時需要注意的。同時，如果讀者能夠配合其他類似照片集，例如日軍隨軍記者和外籍新聞記者所拍攝的照片，乃至中共方面的影像材料，或許可以得到一個更多元的歷史視野。不過即使如此，本套書所展現的影像仍是非常豐富與罕見的，這些凝結的歷史瞬間顯示出中國人的堅忍與苦難，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的重要篇章。經由影像所述說的各種各樣感人故事，在我們掩卷之後仍將縈繞心頭。
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

黃克武

導讀

國共競合， 細說從頭

中國國民黨創立於清季，倡導反帝制革命，協和各方志士，歷經十七年奮鬥，於1912年肇建了民主中華民國。中國共產黨在五四新文化浪潮激盪下，得到蘇聯共產黨扶助，於1921年成立。兩黨實行之主義不同，建國道路也不一致，然而在帝國主義列強與軍閥當道的北洋政府時代，卻有著共同的努力目標，即掃除軍閥、打倒帝國主義、完成國家統一。因此形成既合作又競爭的特殊關係，後又演變成武力對抗的嚴重衝突，導致政局動盪、社會不安，最終走上隔海對立的難解僵局。

一、

兩黨關係之交集，源起於五四時代，社會主義狂飆的年代。國民黨眼見新思潮澎湃，不僅在上海創辦《建設》雜誌，討論社會主義，而且改黨名為中國國民黨。更自民國9年11月起，接連與蘇俄代表維廷斯基（Gregori Naumovich Voitinsky）、馬林（G. Maring）、達林等人接觸，相互了解，並談及國共合作話題。孫中山初時猶疑，及對共產黨有較多認識，才表示「平行合作」意願。民國11年1月，孫中山歷經親信部將陳炯明叛離之後，寓居上海，痛心疾首，亟謀革新黨務。蘇俄特使越飛（Abram Adolf Abrahamvich Joffe）銜命到了上海，經會談，是月26日共同發表宣言，確定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方針。隨後，孫中山聘蘇俄代表鮑羅廷（Michael Borodin）為顧問，到中國來協助國民黨改組工作。

與此同時，孫中山特派蔣中正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，於民國12年8月中旬至11月下旬赴俄，考察俄國革命後的黨務、軍事與政治。蔣氏返抵國門後，即呈送一份「遊俄報告書」，陳述考察見聞，可是這份報告從未面世，惟從他事後撰寫的資料，仍約略透露考察心得。他肯定蘇俄在一些方面的進步，但認為「俄黨殊無誠意可言」、「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」，絕不能相信可以始終合作。此外，黨內也有若干元老同志不認同「聯俄容共」政策，據理力爭。孫中山總理為了壯大革命力量，完成北伐統一大業，意志堅定，均不為所動。

二、

民國 13 年 1 月下旬，在孫中山主導之下，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，宣告改組工作完成及聯俄容共政策實行。會議期間，與會中共代表曾針對黨內質疑，明白表示他們加入國民黨的基本態度和立場。譚平山宣稱：三民主義是國民革命唯一的指南，凡屬黨員所有言行或一切活動，都要時刻不離開主義；不明瞭主義，不配稱為國民黨黨員；不為三民主義奮鬥，不能冒稱國民黨黨員。李大釗公開發言：「我等之加入本黨，是為了有所貢獻於本黨，以貢獻於國民革命事業而來的，斷乎不是為取巧討便宜。」會中選舉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二十四人，共產黨員有李大釗、譚平山、于樹德當選；林祖涵、毛澤東、張國燾、瞿秋白、沈定一、于方舟、韓麟等人當選候補執行委員。會後組成中央常務委員會，譚平山為中常委兼組織部長，林祖涵為農民部長。毛澤東先是奉派到上海執行部工作，後來改派代理宣傳部長。整體而言，中共黨員在國民黨內占有相當職位。

此外，俄籍軍事顧問也派駐國民黨內，提供軍事援助。蔣中正奉命創辦黃埔陸軍軍官學校，訓練革命軍，軍校生中不乏共產黨員，周恩來亦擔任政治部副主任。孫中山為落實改組成效，致力宣講三民主義，以喚醒民眾共同奮鬥。之後，展開北伐軍事行動。是年 10 月，北方政局劇變，直系大總統曹錕與東北張作霖在關外爭戰。直系將領馮玉祥倒戈，揮師北京，迫曹錕下野，擁段祺瑞出任大元帥，將清廢帝溥儀趕出故宮。馮玉祥、段祺瑞即電邀孫中山北上，共商和平建國大計。孫中山力排眾阻，北上赴約，不料心願未了，於次年 3 月病逝北京，靈柩暫厝西山碧雲寺。

斯時，蔣中正率領革命軍討伐盤據惠州的陳炯明，統合兩廣地方軍政勢力。孫總理去世後，國民黨內部矛盾浮現，左右派傾軋，加上共產黨挑撥，致兄弟鬩牆，向來反對聯俄容共同志被迫出走，赴西山碧雲寺另組中央對抗。民國 14 年 8 月，廖仲愷遇刺身亡，胡漢民因被影射主使而遠走國外。蔣中正擁有軍力，也受到左派及蘇俄顧問聯手排擠，一度想剃度出家，遠離政治漩渦。15 年 3 月，中山艦事件發生，蔣中正先發制人，取得反敗為勝契機，限制俄籍顧問與共黨在國民黨內的活動。汪精衛不滿蔣氏專擅自為，憤而出國。蔣中正逐步掌控黨政軍實權，是年 7 月領導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，兩年之間終結軍閥統治，完成國家統一。

三、

國民革命軍北伐，前期軍事進展順利，打敗直系軍閥吳佩孚，克復湖北、江西。國民黨中央自廣州移至武漢，左派勢力和共產黨聯手牽制蔣中正。民國 16 年 3 月下旬，北伐軍克復上海、南京，本可乘勝直搗北京，但在這關鍵時刻，共產黨人煽動群眾攻擊外國使館，企圖引起國際交涉以阻撓。4 月初，武漢方面發起「迎汪復職」運動以反蔣。汪精衛回到上海，曾與蔣氏會商解決黨爭之策。吳稚暉為促成兩人合作，不惜跪求汪氏。汪氏且一度與陳獨秀發表「聯合宣言」，要求共產黨人和群眾拋棄猜疑，不聽信謠言，開誠協商。可是汪氏表裡不一，旋赴武漢主持。

當此關頭，蔡元培、吳稚暉、胡漢民等元老同志洞察機先，以中央監察委員會名義，舉發共產黨禍黨陰謀，籲請中央採取非常緊急措置，加以查辦，並開列包括鮑羅廷、陳獨秀、譚平山、林祖涵等人在內的「應先看管者」名單一百九十七人。隨後決定清黨。4 月 9 日，上海實施戒嚴；4 月 12 日凌晨，解除二千七百餘名工人糾察隊武裝，占領上海總工會，逮捕共產黨員和工人領袖一千多名。在南京，即成立以胡漢民為首的中央，造成「寧漢分裂」局面。廣州等各地亦配合，展開清黨行動。

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政府進行北伐，也獲致若干戰果。但由於工農運動過火，商店、工廠紛紛歇業或倒閉，經濟、財政情況顯著惡化，引起夏斗寅、許克祥、何鍵、朱培德等軍官不滿，5 月間分別在湖南、江西合演反共潮。6 月底，馮玉祥、閻錫山等相繼宣布支持南京，使武漢方面失去北方屏障；汪精衛眼見客觀形勢不利，立場逐漸動搖，亦在 7 月 15 日實行分共。對於南京清黨與武漢分共，在上海標榜反共的「西山會議派」同表支持。三方倡議團結，協定共組「特別委員會」，統一行使黨務與政治。9 月 13 日，該委員會在南京成立，汪精衛、蔣中正、胡漢民皆被推為特別委員。但是蔣中正在部分黨人要求下已先辭職，後於 9 月下旬東渡日本，訪友考察，11 月 10 日才返抵上海。各界齊聲請求蔣氏復職，繼續領導北伐。

民國 17 年 1 月，蔣中正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，籌劃第二期北伐。國民黨於 2 月初在南京中央黨部舉行二屆四中全會，通過中央黨部改組、集中革命勢力限期北伐，以及徹底整頓地方黨務等要案，正式宣告聯俄容共政策之結束。

四、

國共合作關係破裂，中共立即在各地組織武裝，反抗國民黨。民國 16 年 8 月，中共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，檢討國共合作時期統一戰線工作的經驗與教訓，結束陳獨秀的中央領導，選舉瞿秋白等三人組成臨時中央，確立採行武裝暴動方針，決定開展土地革命鬥爭。民國 18 年春起，毛澤東、朱德率領工農紅軍進入江西南部闢建根據地。隨後，便以江西為中心，向周邊省分湖南、湖北、福建、安徽、廣西擴展地盤。從民國 16 年下半年到 19 年夏，中共在各地建立十餘處大小不一的農村根據地，武力達十萬人。民國 20 年，共黨中央從上海遷往江西瑞金，11 月在瑞金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，成立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」，以毛澤東為主席、朱德為軍事委員會主席，正式與南京國民政府分庭抗禮，造成「國中有國」之怪象。

國民黨完成北伐，成為執政黨。國民政府實施國軍編遣，引發李宗仁、閻錫山、馮玉祥等實力派將領不滿，乃結合國民黨內反對勢力「改組派」、「西山會議派」，於民國 19 年 5 月反抗中央政府，釀成「中原大戰」，持續幾近半年。戰事落幕後，國民政府積極展開剿共軍事行動，至民國 22 年止，五次進擊瑞金及其他地區的共黨根據地。前三次剿共軍事，或因戰略失誤，或由於日本侵略東北，故未能收效。民國 22 年初，發動第四次圍攻，又因日軍侵犯華北而被迫停止。是年 10 月，八十萬國軍向共黨中央根據地及鄰近湘、贛、閩、浙等據點發動第五次圍剿，採用「七分政治，三分軍事」戰略及封鎖戰術。民國 23 年 10 月，中共不敵，自瑞金突圍，轉經湖南、廣西、雲南、四川、青海、甘肅等省。國軍沿途追擊。中共經一年逃竄，24 年 10 月落腳陝北，紅軍不足三萬人，此即其宣稱的「二萬五千里長征」。

國民政府立即成立「陝北剿匪總司令部」，以張學良為副總司令，執行剿滅任務。中共為挽救垂危命運，利用日本進逼華北情勢，提出倒蔣、聯共、聯蘇以抗日的計畫，對張學良進行統戰。張氏昧於大勢，竟然附和其「停止內戰，一致抗日」主張，暗與接觸，擅自停止剿共。蔣中正委員長洞察中共詭計，民國 25 年 12 月初親往西安督戰。張學良勸說蔣委員長接受其主張不遂，乃與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合謀，於 12 月 12 日清晨發動兵變，脅持駐節華清池的蔣委員長，並扣押隨從人員，強迫同意他們提出的改組政府、停止內戰等八項主張，是即震驚中外的「西安事變」。

中共乍聞事變，極感振奮，要求解送蔣委員長到延安，接受公審。惟莫斯科共產國際不表支持，下達「保證蔣委員長生命安全」指示。共方並應張學良之邀，派周恩來等三人前往西安協商。事變一起，南京國民政府恩威並濟，奔走營救；蔣夫人與宋子文在關鍵時刻亦連袂前往西安調處。12月25日，事變和平落幕。張學良不顧反對，伴隨蔣委員長回南京，坦然接受軍法審判，從此失去自由；楊虎城則受到寬貸，赴歐美考察。西安事變使剿共軍事功虧一簣。民國26年2月，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，通過「根絕赤禍案」。會後，國共經過數次會談，逐步達成抗日共識。雙方持續十年的抗爭，遂告一段落。

五、

西安事變之重要歷史意義，在於國民政府因此調整「安內攘外」政策。日本眼見國共關係趨於和解，加快全面侵華腳步。民國26年7月，日軍在河北省宛平縣的盧溝橋製造爭端，點燃戰火。國民政府不再忍讓，宣示和平已到最後關頭，決抗戰到底。中共也適時提出四項保證，支持政府抗戰。國民政府基於團結一致抗日，接納其共赴國難的要求，將中共西北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（亦稱八路軍），任朱德、彭德懷為正副總司令；江南一帶的紅軍游擊隊則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（簡稱新四軍），任葉挺、項英為正副軍長。

抗戰初期，國難當前，雙方大體尚能合作無間。但無可諱言，中共參加抗戰除了基於民族大義之外，另有乘機坐大的居心。因此，隨著戰事發展，中共實力逐漸擴充，與國軍的衝突增多。國民黨有鑑於此，民國28年1月召開五屆五中全會，確定「防共、限共、溶共」方針後，又陸續制定「限制異黨活動辦法」等多項法規，加強防患共黨之藉機發展。但中共堅持獨立發展的原則，致各地摩擦事件層出不窮。同年7月，中共發表抗戰兩週年紀念文告，宣示「堅持抗戰，反對投降；堅持團結，反對分裂」，但也承認兩黨合作過程中常有摩擦。他們寫信給國民黨總裁蔣中正，明白指出：許多地方常有逮捕和殺害共產黨員之事。在陝甘寧邊區，少數不明大義分子，遂藉以作無謂之摩擦，查禁書報，侮蔑言論，甚至八路軍傷病員兵在三原附近亦被地方當局武裝包圍威脅，幾至釀成流血慘劇。其他歧視共產黨員與八路

軍員兵之事，不一而足。特別在冀魯等敵後游擊區域中，各種排擠、汙衊八路軍與共產黨之行為，幾乎每日皆有。抗戰勝利後，毛澤東應邀到重慶會談，亦坦稱：「抗戰八年，大家一致打日本。但是內戰是沒有斷的，不斷的、大大小小的摩擦。要說沒有內戰，是欺騙，是不符實際的。」

在眾多摩擦事件中最為重大者，不外民國 30 年 1 月的「新四軍事件」。在皖南的新四軍違抗調防命令，反向攻擊國軍，第三戰區司令官顧祝同下令予以解散，逮捕新四軍軍長葉挺，副軍長項英於逃亡中被殺，共軍多人死亡。不過，新四軍並未因此結束，後由陳毅及劉少奇重建，繼續在皖南活動。深究摩擦根由，實因中共自抗戰以來一直保持獨立發展的策略。俄人彼得·弗拉基米洛夫（Peter Vladimirov）深入觀察，在《延安日記》就說：「到前線去跑一趟，使我確信中共領導並不想打日本人。他們把戰爭看成是建立自己根據地的良好時機，而且不是靠自己的部隊，而是靠日本和國民黨兩股力量對峙來建立他們的根據地。必要時，他們會幹掉抗日統一戰線中的戰友，而奪取政權。」由事後觀察，其指控斷非無的放矢。

六、

民國 34 年 8 月，美國先後在日本廣島、長崎投下原子彈，造成二十多萬日本人因核爆死亡。日本政府不得不低頭。是月 14 日，天皇宣布接受同盟國「波茨坦宣言」，無條件投降。中華民國獲得最後勝利。

抗戰勝利後，中共問題仍為政局發展的重心。中共邊區政府轄下的軍隊拒不接受中央政府就地駐防命令，擅自接收不少地區和城市；更在蘇俄協助下，分別由海、陸兩路進入東北，接收日本關東軍留下的大量武器裝備及東北工業。中共力量因此迅速壯大，勝利之初，其控制的解放區已達一百多萬平方公里、人口一億人，擁有一百萬軍隊。

在政治上，中共提出「在和平、民主、團結的基礎上，實現全國統一，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」口號，要求國民政府承認其建立的邊區政府與軍隊，以及各黨派的合法地位；要求成立聯合政府，召開由各黨派和無黨派代表人士參加的會議。國民政府主席蔣中

正釋出善意，三次電邀毛澤東至重慶會談，美國亦出面斡旋，駐華大使赫爾利（Patrick Jay Hurley）專程前往延安，敦促毛澤東到重慶一行。在赫爾利與政府代表張治中陪同下，毛澤東、周恩來等人於8月19日抵達重慶訪問。蔣主席接待毛澤東，並與面談。自9月3日至10月10日，政府與中共代表進行五次會談後，發表「會談紀要」（一稱「雙十協定」），商定和平建國、政治民主化、軍隊國家化和黨派平等合法等幾項原則。不過，雙方在中共邊區政府及受降地區等問題上，未能達成協議，軍事衝突日趨激烈。為此，美國總統杜魯門（Harry S. Truman）又派馬歇爾（George Catlett Marshall）為特使，於12月間到中國進行調處。民國35年1月，雙方簽訂軍事停戰協定，但並未能貫徹執行。馬歇爾歷時一年折衝，調處不成，奉召回國。中國再次面臨內戰危機。

民國36年2月，國共在東北、熱河、察哈爾各地爆發內戰。最初國軍兵力較多，又得到美國援助，軍事上居於優勢，3月間一度攻克延安，逼使共黨退至鄉間。中共轉而在大城市發動宣傳戰及製造學潮，困擾政府。後由於蘇俄援助，中共實力增強，自秋季開始，共軍在東北、華北、西北、華中各地反攻，至民國37年上半年，已成功阻斷國軍的戰區及交通線，使國軍反而漸處於劣勢。開戰兩年，國軍由四百三十萬減至三百二十五萬，共軍則由一百三十萬增至二百八十萬。是年下半年起，國共在東北、華北爆發三場決定性戰役：瀋陽會戰、徐蚌會戰、平津會戰，國軍均以敗戰收場，損失精銳部隊約一百五十萬人。至38年1月，長江以北幾盡入中共之手。政府扼守江南，仍得面對經濟瀕臨崩潰及民心思變之困境。

在此前後，國內瀰漫和談空氣。中共運用和戰兩手策略，提出八項和平條件，包括懲辦戰犯、廢除偽憲法及偽法統、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、沒收官僚資本、改革土地制度、廢除賣國條約、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、成立民主聯合政府、接收南京政權等，並聲明以此為基礎的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。國民黨內部倡議和談聲浪興起，蔣中正總統迫於壓力，是年1月21日宣示引退。總統職權，依憲法規定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。

李宗仁上任後，聲稱願在中共提出的八項條件基礎上進行談判，獲得據守武漢的桂系將領白崇禧之贊同。李代總統擬訂「談判腹案」，企圖形成「隔江而治」之局。4月1日，政

府和談代表以張治中為首，一行十一人抵達北平展開談判。關於共軍是否過江問題，中共明確表示要「將革命進行到底」，但為使談判順利進行，談判期間暫不會過江。經過數次談判，雙方達成「國內和平協定」修正案八條二十四款，可說是北平談判的初步成果。但由於中共態度堅決，隔江而治願望不能達成，白崇禧立場乃丕變，宣示：「只要中共堅持渡江，便不能接納和議。」政府經過討論，最後決定拒絕簽字。4月下旬，談判破局，十一位政府和談代表在中共說服下，一致留滯北平。中共揮軍強渡長江，南京撤守。

李代總統置職務於不顧，飛往桂林，半年後棄職赴美，留下難以收拾的殘局。4月27日，蔣中正以國民黨總裁身分發表〈告全國同胞書〉，宣告：和平絕望，奮鬥到底。旋登太康艦赴上海，激勵守衛將士及搶運物資。5月初，乘江靜輪抵舟山，駐節十日，遍歷大小島嶼，察看各方形勢後，離開舟山。5月26日經澎湖到臺灣，力謀撥亂反正之道。然而，大勢已去，蔣氏終究無法挽回頹勢，12月10日，中華民國政府撤遷臺灣，與中共形成隔海對峙局面。

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研究所副教授

邵銘峰